

■ 史海钩沉

王安石当朝
亲家被“回避”

读《宋史》和《续通鉴长编》二书，了解了吴充这个人。宋神宗即位后，任用了敢于直言的吴充为同知谏院，掌握言路。不久，王安石由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，成了执政官，吴充便“引嫌解谏职，知审判刑，权三司使”。王安石提拔了，吴充为什么要避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他们二人是儿女亲家，王安石的长女就是吴充次子的妻子。

如果仅此也就罢了，熙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070年，与王安石一起执政的陈升之闹情绪请病假，曾公亮以年老罢相，韩绛因西夏骚扰担任陕西宣抚使去了，政府内部严重缺员，于是神宗欲用吴充担任参知政事，王安石一听不同意了，“充与臣有亲嫌”，怎么能安排在同一岗位上呢，尽管神宗认为他们二人都很正派，“以为无害”，但由于王安石的阻挠，吴充整整6年没有当上宰相，直到1076年，“安石去”，他才在宰相位上上过把瘾。

其实，古代的官员回避制度，远远要比这严格得多，最起码官员是不能在老家担任职务的，不仅如此，就是曾经寄居过的地方，也要回避，即使是临时性的出差，也绝对避免回本贯“勾当公事”，也就是说，在官员出差时，顺便回老家看看的便宜，也是制度所不允许的。

至于亲戚关系的同地任职，上下级任职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律禁止，《文献通考》中记载了一件相反的事情，也就是有兄弟俩在同地任职的案例。那是在唐太宗时期，有廉能之名的贾敦实担任饶阳县令后，他的哥哥贾敦复又被唐太宗派往瀛洲任刺史，成了弟弟贾敦实上司，按当时制度，“大功以下不得联职”，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员，都不能在一个部门任职，何况是亲兄弟。但唐太宗却打破惯例，“以其兄弟廉谨，许令同州”。这件事也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古代“回避”制度的严格。

在宋代，还有一项特殊的回避，那就是宗族、妻家在该地拥有田产物业的，当事人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做官。《朱文公集》中就有这样的字眼：“熹祖乡徽州，正属本路，见有坟墓、宗族、田产在婺源”，“在法也合回避”。《吏部条法总类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，凡“应参选注阙官”，俱须于差注前验证“本官委的有无祖产并妻家田产在所射处”。

看样子，“公务员”如实申报财产的制度，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，它是伴随着官员的回避制度一起产生的，对官员腐败，起到了防范作用。 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

东方红一号卫星乐音装置



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东方红卫星发射塔依旧矗立。

1961年4月12日，苏联宇航员尤里·加加林乘坐“东方一号”宇宙飞船进入太空，在完成绕地球飞行一圈后，乘坐返回舱成功返回地面，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人。2011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，将每年的4月12日确定为国际载人航天日。

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。2016年3月8日，国务院批复同意，自2016年起，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“中国航天日”。

作为亲历者，长期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的杨照德研究员，讲述了“东方红一号”诞生内幕。

46岁东方红一号还在天上飞

“大跃进”与放卫星

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，举世震惊。中国高层极为重视。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。这项绝密的工作因而被定为代号“581”。

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，堪称“放卫星”之年，各行各业都争着“放卫星”。但其时中国经济各个方面距发射卫星的条件差得很远，受大跃进热潮影响，科学院提出放重型卫星，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。一帮年轻人干劲十足，夜以继日，苦干了三个月。当年10月就用手工敲打出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，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。

由于科技人员缺乏火箭、卫星基础理论知识，没有设计资料、计算手段，总体设计参数难于选择。试验手段与测试条件更差，材料、元件供应不上，一大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，卫星研制工作搁浅了。

遭“老大哥”冷遇

1958年10月，由赵九章、卫一清、杨嘉墀、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“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”到苏联考察，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。

代表团到达后住进了莫斯科中国饭店，接待的人很热情，安排参观市容、博物馆，就是不安排到科研机构参观。接待的人说，参观卫星设备要赫鲁晓夫批准，所以一直拖延。以致代表团呆了两个半月，都未能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。由于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，关于合作、技术援助问题更是没有涉及。

虽然没有达到考察卫星研制的目的，但苏联先进的工业和科技还是让中国的科学家意识到，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、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，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后盾。

1959年1月21日，主持领导卫星研制工作的张劲夫向科学院传达邓小平的指示，“卫星明年不放，与国力不相称”、“卫星还是要搞，但是要推后一点”。根据中央方针，暂停卫星研制工作，集中力量先搞探空火箭。

“651”任务

1960年2月，中国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。此后，各种不同用途的探空火箭相继上天，有气象火箭、生物火箭等。1964年6月，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；10月，爆炸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。此时，中国在卫星能源、卫星温度控制、卫星结构、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。此时中国科学家觉得发卫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

1964年12月全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，积极倡导中国要搞人造卫星的赵九章上书周总理，建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。同时，钱学森也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人造卫星。1965年5月，周恩来总理指示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具体方案。负责卫星总体组的钱骥很快拿出初步方案，分别向张劲夫等科学院领导和罗舜初等国防科委领导作了详细汇报，并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。

1965年8月，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，原则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。因是1月份提议，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定名为“651”任务。

重量上超苏美

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，召开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，会上确定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，其任务是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、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；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；成功的标志是“上得去、抓得住、听得见、看得见。”

会上较为保密论证的一个议题，是第一颗卫星重量如何确定。这一问题涉及到导弹武器的水平。因为早期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，都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放卫星实质上是展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。

虽然中国卫星工程起步较晚，但专家都认为第一颗卫星在重量、技术上要做到比美、苏第一颗卫星先进。苏联第一个卫星重量83.6公斤，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.2公斤。会议最后确定中国第一颗卫星为100公斤左右（上天时是173公斤）。

为何取名“东方红”

提起“东方红一号”的命名以及从太空中发出的“东方红”悠扬乐音，不能不谈到中国航天事业中一位默默无闻的铺路人——何正华。

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嘀嗒嗒的电报码，遥测信号是间断的。卫星总体组的组长何正华认为，中国应该超过苏联，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，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，全球公认。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呼号是“东方红”乐曲，某种意义上“东方红”也成了“红色中国”的象征。何正华亦提出将卫星命名为“东方红一号”。1966年5月，经国防科工委、中国科学院、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、张劲夫、裴丽生、钱学森等共同商定，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“东方红一号”。1967年初正式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《东方红》音乐，让全球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。

当时正处于“文革”，播送“东方红”乐音不仅是科研任务，也是政治任务。在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下，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冒着政治风险，开始了技术上的探索，解决了乐音错乱和乐音变调等一系列问题。“东方红”乐音最后采用电子音乐，用线路模拟铝板琴声奏出。

至今仍在天上飞

1970年4月1日，装载两颗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、一枚“长征一号”运载火箭的专门列车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。

1970年4月24日3点50分，周恩来总理电话告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：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，希望大家鼓足干劲，过细地做工作，要一次成功，为祖国争光。

1970年4月25日18点，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：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。

由于化学电池寿命有限，东方红一号的设计工作寿命只有20天。它实际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，1970年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，与地面失去联系。虽然卫星早已停止工作，却一直在太空中飞行。据观测，直到2009年2月，它还运行在近地点430千米、远地点2075千米的轨道上。 摘自《军工文化》